

浅析晚商殷墟居民区祭祀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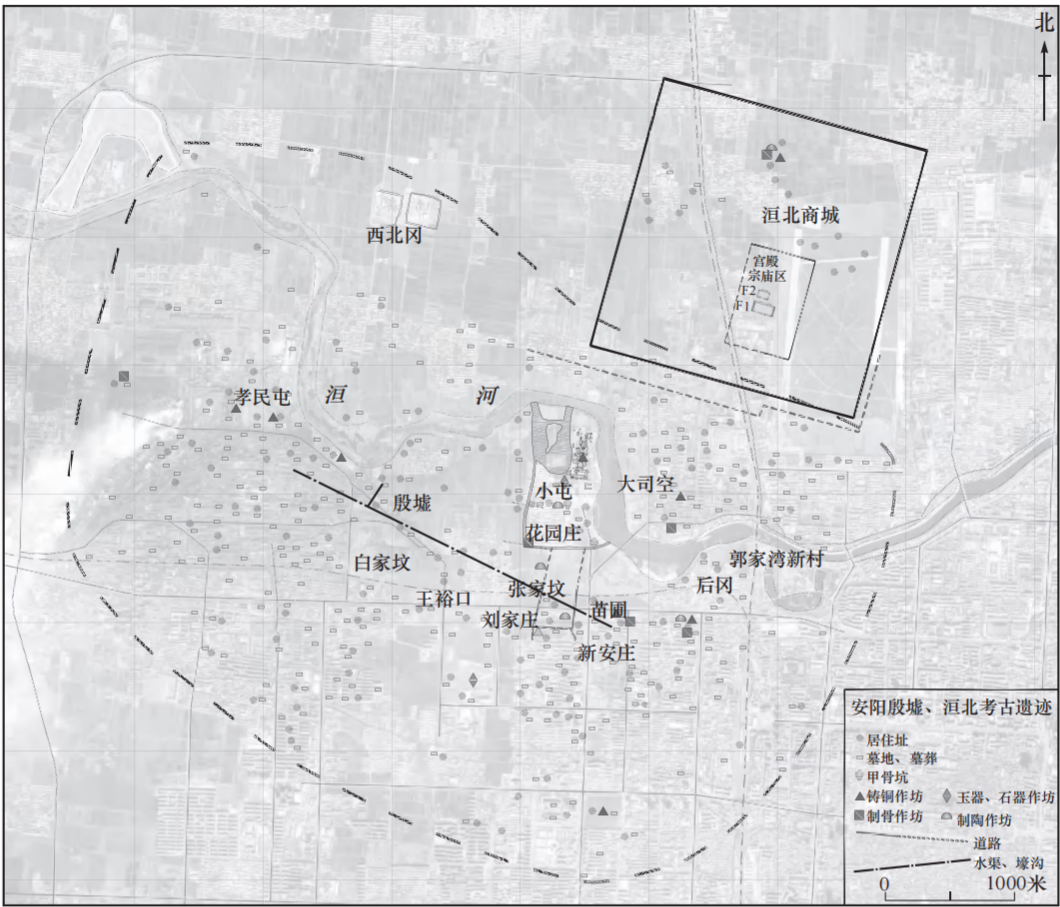
吴梦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祭祀遗存是殷墟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对理解早期中国的宗教思想与意识形态具有关键作用。《礼记·表記》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文化带有鲜明的祭祀色彩，甲骨和金文材料中有见两百多个祭名以描述不同种类和方法的祭祀活动^[1]，充分体现出晚商时期祭祀的频繁发生与形式多样。安阳西北冈王陵区和小屯宗庙宫殿区发现了大量祭祀遗迹，为王室阶层举行的例行祭祖活动，以及在大型建筑的营建过程，如奠基、置础、安门、落成等仪式中杀牲献祭提供了实例^[2]。随着近年殷墟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逐步转向以城市规划和运作为重心，普通居民区的发掘、各类遗迹的系统清理和辨析愈发被重视，在小屯和西北冈之外也积累了不少祭祀遗存材料，有待综合考察。需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祭祀遗存特指位于居民区，人类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遗迹单位，不包括与墓葬（如人殉）、建筑（如瓮棺葬）相关的考古发现。其中，以后冈圆坑墓 H10^[3]、大司空杀殉坑 M14^[4] 和小屯南地祭祀坑 H33^[5] 较为学界熟知，均发现数量较多的人骨，且存在暴力杀戮和肢解的现象。然而，除上述个别单位的论证，长期以来学界对祭祀的关注显失均衡，针对普通居民区祭祀遗存的研究实则相对滞后，甚至于在遗存性质的界定上亦存在诸多争议。鉴于此，本文拟由三部分展开：首先，系统梳理已发表的殷墟居民区祭祀遗存；其次，归纳学界的主要观点与分歧；最后，试确立祭祀遗存的判别标准，强调从“行为（action）”本身的识别出发，并提供几种应用较广泛的科技方法作为参考，展望进一步分析祭祀遗存的可行性。

一、考古发现

迄今为止，已在安阳大司空、新安庄西地、刘家庄北地、王裕口南地、郭家湾新村等十多处殷墟时期普通居民点发现了不少与祭祀相关的遗存（图一；附表一），有单独埋人、动物或器物，也有多种遗物混合的现象。根据具体发现地点，选取典型单位描述。



图一 安阳殷墟时期居民区祭祀遗存发现地点示意图

(一) 道路

2000 年,在位于洹河北岸的郭家湾新村发现了东北、西南走向的商代道路 L1,路中有车辙四道,路面近平,有人工修筑垫层。在探方 T11 内大型车道的路基垫土中发现牛头骨 6 个,南北向有序排列,年代下限不晚于殷墟一期早段,报告中推测应是在道路始建或后期修补时举行祭祀活动留下的奠基遗存^[6]。

刘家庄北地遗址 2008 年发掘发现祭祀遗存多处,主要集中在 XI 区的东西向道路 L10 南北两侧,南侧大多没有发掘^[7]。共计清理 18 处,其中祭祀坑 H524 地处 L10 北侧的斜坡上,坑口距地表 1.65~3.85 米,平面形状呈椭圆形,长径 8、短径 5.5 米,坑内填土分 2 层。第 1 层又可细分为两亚层,上层为黄灰色土,土质松软,发现全躯人骨 3 具,均为女性,马骨 2 具,雄性;下层有人骨 3 具、马骨 14 具、黄牛 9 具、猪 5 具,人骨残缺不全,鉴别 1 名男性、1 名疑似男性和 1 名不详,年龄在 16~30 岁之间,大部分动物骨架不完整,很可能为肢解后埋入,砍割痕迹明显。为原地保护骨骼标本,第 2 层填土

未做进一步发掘。陶片从殷墟三期到四期均有，年代跨度较大。

（二）水井

2009年王裕口南地发现水井J5，应是废弃后成为祭祀坑^[8]。其平面形状近椭圆形，底部呈圆角长方形，开口直径1.5~2.4米，口距地表4.25、深9.1米。祭祀堆积分4层，第1层距井口0.5~0.8米，有5具相互叠压的人骨及无下颌的马头骨1个，人骨部分残缺不全。第2层距井口3.3米，有1具人骨，骨架基本完整。第3层距井口4~4.2米，发现大量散乱兽骨，另有1片卜骨和2片肩胛骨。第4层距井口4.2~4.3米，有大量散乱的动物脊椎骨、肋骨、趾骨等，另出1件完整陶鬲和1个猪头骨。6具人骨经鉴别为三名成年男性、两名成年女性和一名7~9岁儿童。年代属殷墟三期。

辛店遗址2018~2019发掘中发现祭祀坑H340^[9]，该坑分为上、下两部分，现存坑口距地表2.2米。上部分平面呈椭圆形，南北残长径4.73、东西短径1.9~3.41米，坑深4.52米，斜壁，平底。坑内填土分5层，第3层底部叠压放置两层兽骨及人骨，辨明1具狗骨架、10具猪骨架和1具成年男性。第4层有叠压放置的五层兽骨，共计狗骨架1具和猪骨架17具。第5层清理出三层兽骨，其中牛头骨1个和猪骨架19具。底部堆积大量陶器残片，可辨器形有鬲、簋、罐、甗、盆、瓮等，另有3件完整陶罐，陶片少量属殷墟三期，多数为殷墟四期。H340下部分南北并列两个近圆形坑K1和K2，发现人骨及动物骨骼。发掘者推测H340应为水井，废弃后进行多次祭祀活动，可能与青铜器铸造的某个环节有关。

（三）窖穴

H276位于大司空村2004年发掘区^[10]，坑上部平面近似椭圆形，下部为长方形，坑口南北长径4.6、东西短径3.54、深8.7米，坑壁倾斜向下，较规则整齐，由坑室东北至东南边沿有一周台阶。坑内填土分2层，上层为长方形窖穴以上部分，深灰色土，厚2.8~3.2米，上层出土陶片和兽骨若干以及卜骨1件、人架2具、完整牛架1具，骨骼均放置坑室东南部。人骨架散乱，呈现非正常死亡状态，可能是砍杀致死。下层为长方形窖穴内堆积，浅灰色土，土质较软，厚8.7米，下层包含物较少。此坑性质特殊，发掘中共发现两例（另一例为H333，与H276相距不远），总体特征是上部有一带台阶的大坑，原应有棚顶，坑底再挖一长方形坑、深及地下水面，发掘者推测此坑原为冷藏用窖穴，废弃后作为生活垃圾坑，填封坑口时举行了重要的仪式活动。

（四）灰坑

灰坑埋人在殷墟并不少见，不乏现象特殊者。以2017年大司空东南地考古发现为例，其中H158平面形状呈椭圆形，直壁平底，坑口长径1.68米，短径1.2米，口距地表2.85米，深2.3米。坑内填灰花土，含少量兽骨和陶片。坑底有两个跪姿人架，旁

各置一陶鬲,人头上各扣一陶甗^[11]。这种特殊的埋葬方式,是否是一种新的祭祀方式还有待考证,也不排除是商代的某种刑罚方式,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尚属首例。

新安庄西地 2007 年发掘清理祭祀遗迹 H221^[12](图二),平面面积甚大,仅西边线在发掘区内,其他三边均延伸至发掘区外,故其范围、形状不甚清晰。发掘长度为 14 米、宽 7.9 米、最深处约 1.9 米。坑内填土分 3 层,第 1 层西南角有散乱人骨。第 2 层为黄褐色灰土,层底出大量人骨、动物骨骼(牛、马、狗、猪等),散乱叠压,几乎无完整个体。第 3 层可分两亚层,上层出土少量陶片、兽骨、人骨,而下层土质致密,含少量木炭、烧土颗粒和陶片。陶片年代从殷墟三期至四期均有发现。发掘者判断该坑最初为一处大型取土坑,后成为一处族邑公共祭祀场所,延续时间较长,祭祀频繁。



图二 2007 年新安庄 H221 平面图

(五) 人工土台

2003~2004 年孝民屯遗址考古发掘,发现形制特殊的环状沟 G1^[13]。口宽底窄,沟壁较为规整,其北、东段沟内各有一长约 8.8 米、宽 0.1 米和高 0.15 米的生土二层台。沟内堆积可分 2 层。第 1 层为夯土,灰褐色,质地坚硬,结构紧密,分布有密集的圆形圈底夯窝,厚 0.02~0.08 米,分布于沟西北角部分区域,未见遗物。第 2 层黄色土块夹杂褐色土块,土质纯净松软,厚 0.75~0.88 米,未见陶片,共清理人骨 15 具、牛头 1 个、铜镞 1 枚。其中,14 具被砍头,有的被肢解,一具人骨下发现 1 枚铜镞,G1 年代应该不晚于殷墟文化三期。

G2 打破 G1,平面呈不规则长条形,周边分布有向下倾斜的台阶,在沟内台阶上发现 3 具人骨。沟内堆积可分 3 层,出土遗物种类较多,陶器为主,还有石器、骨器、蚌器、角器和卜骨。发掘者认为虽然 G1 上部破坏严重,仅剩一个生土台面,但因周围没有发现与建筑相关的遗存,且夯层很薄,不具备作为大型建筑基槽的条件,推测 G1

围起来的区域可能为一处祭祀场所，沟内人骨、兽骨是修建该祭坛时的遗存，而打破沟的一些遗迹单位是使用期间的祭用人性和兽牲^[14]。

二、祭祀遗存的界定与分歧

尽管殷墟普通居民区祭祀相关遗存的数量不少，但形式不一且无明显规律，导致应当如何界定其性质存在很大程度的分歧。在发掘报告中常以“祭祀遗存”或是“祭祀坑”作为概括，也不乏根据遗存组成分为人祭坑、牛坑、马坑、混祭坑等，亦有就出土地点和现象进行判别，比如定性为手工业制造相关的祭祀行为，水井干涸、道路营建的仪式活动，或是公共祭祀场所等。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情况用“刑罚”替代“祭祀”来描述出现不完整人骨架的现象，还有“灰坑葬”或是废坑埋人等说法。关于这类遗存的研究集中在几座为人熟知的大型圆坑，以后冈 H10 为例，赞同“祭祀坑”^[15]之说者较多，也有不少持有“殉葬坑”^[16]、“附属葬坑”^[17]、“特殊墓葬”^[18]等观点，相关讨论仍颇具借鉴意义。

其实，当代考古学研究中屡见把无法解释的特殊现象简单归为祭祀遗存，岳洪彬指出这是一种“泛祭祀倾向”^[19]，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对某些遗迹性质的判别缺乏依据。就如后冈 H10，或是类似的 2017 年大司空东南地 H196，均近似圆坑，出土数量众多的人骨和动物骨骼，但未发现明确的属主（祭祀对象）。岳文中主张其形成原因可能较复杂，难以与祭祀关联，暂将此类遗存称为“乱葬坑”更为合适。他还对祭祀遗存的判定标准提出几点补充，第一是关注遗迹之间的相互联系，祭祀活动有祭祀者和被祭祀者，应从祭祀遗迹和周围遗迹的时空关系入手。第二，考虑辅助证据，如以往发现的相关考古案例，或是大量相对应的文献可作为佐证。此外，还展望科技分析手段的介入为祭祀遗存提供有力依据。

此前谢素的博士论文对商代祭祀类遗存进行了相关梳理，首次涉及殷墟居民区的发现^[20]。其文中一类特指手工业作坊内或附近埋人和动物的坑，推测这些非正常死者与手工业祭祀相关，比如位于殷墟花园庄南地制骨作坊、大司空制骨作坊和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的遗迹单位。这一传统在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紫荆山北作坊遗址和小双桥遗址 VI 区铸铜遗迹，还有洹北商城韩王度铸铜及制骨手工业作坊区均有发现。甲骨文中对青铜器铸造用牺牲祭祀（奠血）的记载（合集 41866）^[21]，苗圃北地的牛坑、马坑可能即是取牺牲之血以鬯器的仪式所遗留^[22]。卜辞中还有见“二珏”（合集 5611），可释为祭宝玉之意^[23]，大概也与玉器制作过程中的祭祀行为或是使用玉器进行祭祀活动有关。另一类则称之为“祭祀对象不明确”，泛指不易确定性质的遗存，比如刘家庄北地道路 L10 两侧的遗存，清理发现大量肢解人骨、兽骨，谢素认为其可视为某个群体的祭品处理场所，但祭祀对象不一定与道路相关。

手工业作坊区祭祀遗存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王迪认为商周制陶作坊中的祭祀遗存与窑神、火神和社的祭祀有关^[24]。常怀颖在对夏商都邑铸铜作坊空间规划研究中,提出自中商小双桥遗址开始,铸铜活动伴随着大规模的牺牲祭祀,两者关系愈发密切,应是铸铜生产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产生了针对生产专门化的祭祀行为^[25]。杨谦则反思基于后世文献对祭祀形式及目的的过度解读,“成物祈求”并非生产祭祀的唯一作用^[26]。该文借鉴“仪式化生产”的概念,意指一种包含了各式信仰行为的生产实践活动,强调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系列的仪式化活动,代表生产技术和信仰实践的有机融合。杨谦指出青铜时代铸铜祭祀活动具有非常典型的“仪式化生产”的特点,保密性和限制性的核心生产知识被视为一种权力资源,通过仪式逐步实现权力的追逐和技术的掌控,最终得以排除社会上其他人获得专业化技术。铸铜祭祀虽与铸铜的成功率和生产效率并无直接关联,但在铸铜核心技术控制和知识传承方面充当了关键角色。

晚商时期洹河两岸分布着密集和普通居民点,用水问题与手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直至21世纪初,地下水的大量开采而导致水位下降,才得以全面展开对殷墟遗址商代水井的发掘。此前因对水井构造不清晰,有误判为特型墓、石子穴或石子墓的情况^[27]。2008年刘家庄北地共清理30余眼水井,值得注意的是水井底部堆积(应是使用过程形成),除掉落的汲水器外,还出土不少与汲水无关的器物。如2008年刘家庄北地J15出土大量泥质红陶罐,却几乎未发现常见的圜底罐(俗称“人头罐”),碎陶片堆积近1米厚,在殷墟发掘史中尚属首次^[28]。J15内发现的陶器残片大多缺失腹片,若是因打水掉落则应该不会破损,说明陶器很可能是在井台上摔碎而部分投入井中。有些水井中甚至还出现青铜礼器且伴有碎器现象,如2008年刘家庄北地J30出土四足铜盃, J31出土铜爵、残铜觚、铜觥盖、铜罍肩部兽首所衔圆环各1件,以及罍、提梁卣等若干铜器残片^[29]。推测这些器物作为祭器,在旱季时通过仪式投送井中以祈求井水丰盈。

发掘者提出的水井祭祀的观点,杨谦建议运用“要素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30]进行甄别。其一,要素指的是参与仪式活动的特定地点、时间、成员、用品、目的等。其二,礼仪逻辑通常具有不符合技术常理的“非理性”特点,即礼仪行为并没有实际功能或实用价值,仪式活动比如占卜、丧葬、祭祖等可以说代表了不理性的投入。其文结合后世典籍“五祀”之说,推断水井礼仪活动所具备的要素,并采用逻辑分析法解释将礼器投入水井的缘由。

三、考古中的判别方法和研究手段

(一) 考古现象的识别

“祭祀是什么”与“什么是祭祀”是两个问题。前者指其意义,后者则偏重考古

现象的识别,解决前者才有可能解答后者。换言之,考古学中应当怎么研究祭祀遗存,取决于如何理解祭祀这一行为。不论持“祭祀说”或“非祭祀说”,首要任务都应当构架清晰的理论视角。与其将祭祀视为与宗教信仰相关,不如定义为涉及杀戮(或毁坏)以及献祭的超自然世界行为^[31]。从理论上可以将祭祀与其他杀戮行为比如动物屠宰、罪犯处决、仪式化决斗区别开来^[32]。这一概念基于凯瑟琳·贝尔的仪式理论(ritualization),将祭祀重塑为“仪式化实践(ritualized practices)”^[33],不仅强调“供奉(offering)”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仪式杀戮(ritual killing)”行为本身在考古工作中的甄别。仪式化实践理论重视多维度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的流动而非反映,祭祀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与其他一系列行为模式的关联才能准确识别,与此同时也促使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时空框架,探究祭祀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并置于相关社会文化背景中讨论其特定内涵与意义。

鉴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殷墟丰富的考古资料,本文认为三个判别内容值得重点关注。第一,有关仪式杀戮的甄别,商代祭祀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暴力手段的使用。在甲骨文中,具体说明祭祀过程中各种活动的动词,其典型者一般称为用牲法,如伐、卯、沉等,此外还有一些往往与祭名混淆不清的动词,例如燎、岁等也代表祭祀相关的方法^[34]。其中,“伐”专指砍头、“刚”指割断、“卯”是对剖、“寻”和“用”都为杀意。殷墟祭祀遗存中许多人头骨下颌或是脊椎都有明显的刀痕、砍痕,不乏人性头骨缺失、腰斩、断手断脚等暴力现象,应是与甲骨文中用牲法相对应的^[35]。

第二,识别共存的遗存和迹象,考量促成祭祀进行的仪式组合。牺牲在商代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了人性,还包括了牛、羊、猪、狗和马等动物^[36]。人性与动物用牲同时并用、同坑埋葬的现象并不少见。后世文献记载对动物用牲的毛色有所要求,某些牺牲的选取或涉及特定种类、部位和年龄。祭品可能还包括黍盛、鬯酒等有机物,以及祭祀用具的使用比如石磬、甲骨等。此外,一些特殊器物(比如青铜器、陶器)的使用也值得关注,往往出土时伴随着烧土和朱砂的痕迹,并呈现破碎或不完整状态。虽然中原地区并没有大规模瘞埋礼器的发现,但因为器物涂朱、碎器、焚烧等形式常见于墓葬或是王室祭祀坑中,具备商代祭祀活动的特性。

第三,空间关系的识别。商代祭祀现象的常见空间为墓葬和建筑,例如墓葬二层台、腰坑、填土,还有建筑相关的基址、门道等,在王室区域和一般居民区均有发现。除此之外,西北冈王陵区和小屯宫殿宗庙区乙组和丙组基址外成规模的祭祀坑也属明确的王室祭祀用地。然而,一般居民区所谓的“祭祀”相关遗存却发现于各式各样的地点中,有道路边、垃圾坑、窖藏坑、水井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提示学者不能对不同遗存的性质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则说明考古发现的遗迹单位并不一定反映祭祀行为实际发生的地点,也许代表了活动完成后处置祭品的方式。因此,在考古工作中,不仅要考察遗迹内的现象和共存关系,还应结合与其他行为的关联。如若发现上述第一、二类判别特征反复出现的空间地点,则可能与仪式活动的举行密切相关。

(二) 科技手段的应用

以上三个判别内容仍有待进一步补充与扩展。譬如杀戮方式,是否在不同祭祀仪式中有特定的选择,对于不同身份的人牲是否有区别?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深入研究祭祀行为展现出新的前景,在生存模式、饮食、来源、亲缘关系和死亡方式等个体生命史方面提供多学科交叉的证据,有助于全面重建祭祀死者及祭品(被)选择、准备、杀害的过程及其所处社会背景,以下就中南美洲、欧洲和近东等地区考古工作及国内的应用简要介绍。

体质人类学手段在祭祀研究中运用较早,除了传统上对受害者性别、年龄的鉴别,古病理学和骨骼创伤分析也逐步推广,对探索献祭人群的身份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对乌尔皇家墓地献祭者人体骨骼的肌群发育状况进行了分析,有个体股骨呈现股内收缩肌连接部位的极度发育,该肌群很可能与战车驾驶时保持高度平衡有关。还有个体锁骨带有梯形韧带和锥形韧带的明显痕迹,显示控制锁骨运动的锁下肌和胸锁筋膜在锁骨中段有深度的附着区域,可能由于长期背负重物形成,暗示这些受害者生前从事马夫、搬运工、士兵等工作^[37]。乌尔皇家墓地人祭CT断层扫描显示,死者头骨受到钝力外伤而产生了平坦的圆形孔洞,还有个体呈颅骨凹陷及辐射状骨折线,说明至少有一些受害者是被殴打致死的,为讨论献祭的目的和自愿性提供思考^[38]。此外,牙釉质形成、蛀牙、童年贫血证据的检视,可以对疾病、营养和生存压力情况进行讨论。秘鲁北岸奇穆文化Túcume遗址人祭的研究发现,受害者呈现身体条件不佳的频率颇高,表明大多生前健康状况很差,生活可能较为艰难^[39]。骨骼创伤研究显示,中南美洲的玛雅和安第斯文化人祭活动涉及多种致命的暴力处置,例如心脏拆除、割喉和斩首,还发现有肢解和割肉的工具切割痕迹^[40]。创伤痕迹的显微分析,能够进一步了解人牲/牺牲的处理方式,比如莫切文化月亮金字塔神庙(Huaca de la Luna)的研究,探讨了切割的工具是否为薄刃,质地为金属或石质,以及切割的方向性,刽子手使用了左手还是右手持工具,死者生前还是死后进行肢解等问题^[41]。

稳定同位素技术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威尔森等人对安第斯山脉主峰发现的四具儿童木乃伊头发进行分析,历时的同位素证据表明,死者在死前一年的饮食中出现显著增加的高蛋白食物,而此前的营养水平却不佳。这些儿童穿着考究,佩戴金属和羽毛头饰、项链和手镯,暗示死者被选中作为献祭者而踏上朝圣之路,进而促成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为研究印加Capacocha仪式过程提供了新信息^[42]。还有涉及动物牺牲的研究,比如羊驼,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祭祀活动中相当重要,斯派克等对维吕山谷献祭羊驼分析显示,仪式所用羊驼基本来自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但是献祭的牺牲与其他用途的羊驼饮食状况很不一样,表明可能进行了区别管理^[43]。此外,牙釉质和骨骼锶、氧同位素的应用为讨论个体来源提供了关键信息。研究发现墨西哥城特奥蒂瓦坎月亮金字塔的人牲可能都出生在外地,来源范围包括了墨西哥盆地、中部高地和墨西

哥湾沿岸以及西南地区。但是月亮金字塔和羽蛇金字塔个体氧同位素比值却有明显差异,应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地点死者的迁徙模式也有所区别,月亮金字塔的献祭者似乎是近期才抵达这座城市,而羽蛇金字塔中大多数人在死前已在特奥蒂瓦坎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44]。

古 DNA 技术的兴起,有助于分析人群亲属关系,对祭祀研究具有积极影响。法国东北部新石器时代 Gougenheim 遗址发现了圆坑葬的习俗,许多学者认为可能和祭祀有关。分析发现“非传统”与“传统”姿势埋葬个体的母系基因库存在一些区别,可能代表了一个特殊群体,相对遗传孤立性很好地呼应了这些人埋葬方式的差异和祭祀的假设,但究竟是因宗教需要而被随机绑架的敌对族群还是社会底层的奴隶,仍值得进一步讨论^[45]。人群的迁徙和流动在阐释文化变迁的复杂性方面有着深远意义,Capacocha 仪式的儿童木乃伊线粒体 DNA 序列显示,其两个单倍群代表着前哥伦比亚时代未发生混合的美洲印第安人群,且发现明显的人群特定变异度。加速器质谱仪测年数据结合所观察到单倍群南倾高频的趋势,推测 Capacocha 朝圣献祭事件可能发生于印加帝国向南扩张和巩固时期^[46]。古 DNA 技术也应用于我国史前占卜材料的分析^[47],研究发现龙山时代家养牛(*Bos Taurus*)和野生牛(*Bos Primigenius*)肩胛骨均是制作卜骨的原材料,但不见野生圣水牛的利用。在晚商时期,虽然青铜器上常常出现圣水牛的形象,但卜骨制作依然将圣水牛排除在外,意味着动物种类经过有意筛选、管理和区别利用,显示古 DNA 技术在理解祭祀用牲及其仪式价值方面极具潜力。

四、小 结

本文考察了殷墟居民区祭祀遗存,通过系统梳理,可以发现此类遗存在小屯和西北冈外有着不少分布,有些出现在灰坑、窖穴、水井内以及道路周边和垫层中,不乏规模较大的遗迹现象。虽然报告中多以“祭祀坑”笼统概括,但这些遗存形式不一,并无明显规律,学界对其认识实则存在一些分歧。手工业作坊附近祭祀现象,还有水井相关的仪式也成为近期焦点问题。事实上考古中祭祀遗存的界定取决于所采用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从仪式的实践行为^[48]本身出发,有三个判别内容值得关注:仪式杀戮、仪式组合以及空间关系。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尚待补充和完善,相信进一步着力于多学科科技分析手段的综合运用,有望更加全面复原晚商祭祀的整体图景。

注 释

- [1] 李立新:《甲骨文中所见祭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3年。
- [2] 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1期。

- [4]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殉坑》，《考古》1978年第1期。
- [5]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郭家湾新村》，科学出版社，2020年。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 [9]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阳市辛店铸铜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11期。
- [10]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 [11] 岳洪彬、岳占伟、牛世山：《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8年8月24日第八版。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新安庄西地2007年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2期。
- [13]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 [14]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环状沟》，《考古》2007年第1期。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一曼、徐广德：《论安阳后冈殷墓》，《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6]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 [17] 赵佩馨：《安阳后岗圆形葬坑性质的讨论》，《考古》1960年第6期。
- [18] 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7年第6期。
- [19] 岳洪彬：《谈谈商代考古学研究中的“泛祭祀倾向”》，《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 [20] 谢肃：《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 [21] 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第5期。
- [22] 刘一曼：《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
- [23] 王宇信：《殷人宝玉、用玉及对玉文化研究的几点启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24] 王迪：《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 [25] 常怀颖：《夏商都邑铸铜作坊空间规划分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
- [26] 杨谦：《成物祈求或技术控制——青铜时代铸铜祭祀功能再析》，《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
- [27] 苗霞：《殷墟“石子窖”和“石子墓”性质探析》，《考古》2020年第3期。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8年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J15发掘简报》，《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

- [30] 杨谦:《考古学视野下的礼仪甄别方法及其反思》,《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
- [31] CAMPBELL R. On Sacrifice: An Archaeology of Shang Sacrifice, in M. Porter and M. Schwartz eds. *Sacred Killing: The Archaeology of Sacrific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diana: Eisenbrauns Inc, 2012:305-324.
- [32] SCHWARTZ G M.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Sacrifi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7(46): 223-240.
- [33]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1992.
- [34]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
- [35] 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6] YUAN J, FLAD R. 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5, 24(3): 252-270.
- [37] MOLLESON T, HODGSON D. The human remains from Woolley's excavations at Ur. *Iraq*, 2003(65): 91-129.
- [38] BAADSGAARD A, et al. Human sacrifice and intentional corpse preservation in the Royal Cemetery of Ur. *Antiquity*, 2011, 85(327): 27-42.
- [39] TOYNE J M. Life Before Death: A Pale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uman Sacrifice at the Templo de la Piedra Sagrada, Túcume, Peru. in H.D. Klaus and J.M. Toyne eds. *Ritual Violence in the Ancient Andes: Reconstructing Sacrifice on the North Coast of Peru*.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 215-243.
- [40] TIESLER V, CUCINA A. New perspectives on human sacrifice and ritual body treatments in ancient Maya society. Heidelberg: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7.
- [41] HAMILTON L. Ritual killing, mutilation, and dismemberment at Huaca de la Luna, in KLAUS H.D and TOYNE J M eds. *Ritual Violence in the Ancient And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 29-63.
- [42] WILSON A S, et al. Archaeological, radiological, and biological evidence offer insight into Inca child sacrif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33): 13322-13327.
- [43] SZPAK P, et al. Small scale camelid husbandry on the north coast of Peru (Virú Valley): Insight from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14, 36: 110-129.
- [44] WHITE C D, PRICE T D, LONGSTAFFE F J. Residential histories of the human sacrifices at the Moon Pyramid, Teotihuacan: evidence from oxygen and strontium isotopes. *Ancient Mesoamerica*, 2007, 18(1): 159-172.
- [45] BEAU A, et al. Multi-scale ancient DNA analyses confirm the western origin of Michelsberg farmers and document probable practices of human sacrifice. *PLOS one*, 2017, 12(7): e0179742.
- [46] WILSON A S, et al. Archaeological, radiological, and biological evidence offer insight into Inca child sacrif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33): 13322-13327.
- [47] BRUNSON K, et al.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s of oracle bone divination: Ancient DNA from Late Neolithic Chinese bovin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6. 74: 35-44.
- [48]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1992.

附表一 殷墟居民区祭祀遗存统计表

遗址	发掘年份	单位	人骨	动物骨骼	出土器物	期别	性质	资料来源
大司空村	1958~1960	H415		√	铜镞	苗圃Ⅲ期	可能与祭祀有关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 (1987, pp.77—81)
	1958~1960	H420		√		苗圃Ⅱ期	可能与祭祀有关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 (1987, p.308, 附表一五)
	1958~1960	H418		√		苗圃Ⅲ期	可能与祭祀有关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 (1987, p.308, 附表一五)
	1971	M14	√			一期	杀殉坑	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殉坑 (考古, 1978.1)
	2004	H203	√			一期晚	储藏窖穴, 后作灰土葬坑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65)
	2004	H407	√		海贝 3 枚	一期晚	属一个或两个家庭, 原为取土坑, 后作集体灰土葬使用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74)
	2004	H431	√		卜骨 6 件, 骨饰、骨锥、铜镞、骨镞、陶罐各 1 件	一期晚	推测为某种刑罚的遗存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76)
	2004	H159		√		二期早	判断此坑原应为一窖穴, 不排除是养马的厩场, 废弃之后作为葬马坑使用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77)
	2004	H391		√		二期早	坑底平整, 不排除为养马厩的可能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85)
	2004	H310	√			三期早	原为储物窖穴, 废弃后作为一行刑埋葬坑使用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89)
	2004	H276	√			三期晚	填封坑口时举行了重要的仪式活动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92)
	2004	H280		√		三期晚	原为储物窖穴, 废弃后作为祭祀坑或垃圾坑使用, 放置 2 具马架, 应是用于某种祭祀活动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95)
	2004	H305	√		卜骨 1 件, 东部凹龕底为一平台放有圜底罐 1 件	三期晚	原为储藏窖穴, 废弃时进行过多次祭祀活动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p.97)

续表

遗址	发掘年份	单位	人骨	动物骨骼	出土器物	期别	性质	资料来源
大司空村	2004	H416	✓			三期晚	灰土葬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 (p.100)
	2004	H91		✓	陶片, 可复原陶鬲 2 件、簋 4 件、甗 2 件、盆 2 件、罐 5 件	四期早	可能是一种祭祀现象, 原为储藏窖穴, 废弃后作生活垃圾坑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 (p.102)
	2004	H128	✓			四期早	原为储物窖穴、废弃后作生活垃圾坑, 人骨可能为简单的祭祀现象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 (p.107)
	2004	H278	✓			四期早	两人何种关系尚不清楚, 可能被截肢或为某种刑罚的遗存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 (p.109)
	2004	H316			底部铺有一层鸡蛋大小的鹅卵石	四期早	特殊用途, 可能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 (p.110)
	2004	H250	✓			四期早	原为储藏窖穴, 废弃后用于某种祭祀活动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 (p.114)
	2004	H387		✓		四期	原为普通窖穴, 废弃后作为葬马坑使用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 (p.118)
大司空村东南地	2017	T1819H158	✓		陶鬲、陶甗		可能是一种新的祭祀形式, 也不排除是某种刑罚方式, 殷墟考古首例	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中国文物报, 2018.5)
	2017	T2019H196	✓				集中埋藏的遗迹, 在以前殷墟发掘中也有不少发现	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中国文物报, 2018.5)
郭家湾新村	2000	M197	✓				祭祀遗存	安阳郭家湾新村 (科学出版社, 2020)
	2000	M342		✓			该坑十分规整, 建造耗费大量劳力, 应是某种祭祀活动的遗存	安阳郭家湾新村 (科学出版社, 2020)
	2000	T11		✓			道路在始建或后期修补所举行的祭祀活动留下的奠基遗存	安阳郭家湾新村 (科学出版社, 2020)

续表

遗址	发掘年份	单位	人骨	动物骨骼	出土器物	期别	性质	资料来源
后冈	1959	H10	√		铜鼎、铜卣、铜爵、铜刀、铜镞和不知用途的铜器各 1 件、铁戈 2 件, 此外还有贝、谷物、丝麻制品、玉/骨笄、海贝串饰等	四期晚	祭祀坑、奴隶、戍卒/嗣子	1971 年后冈发掘简报(考古, 1972.3); 1958—1959 殷墟发掘简报(考古, 1961.2);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p.265—279); 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 1960.1); 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 2007.6)
苗圃北地	1958~1961	F8	√			苗圃Ⅲ期	奠基坑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p.26—28)
	1958~1961	H202			碎陶范 90 件、熔炉、磨石	苗圃Ⅲ期	铸铜有关的祭祀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p.26—28)
	1958~1961	T1(4)		√		苗圃Ⅲ期	铸铜有关的祭祀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288, 附表五)
	1958~1961	H36		√	少许陶片	苗圃Ⅲ期	铸铜有关的祭祀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26~28)
	1958~1961	H25	√	√		苗圃Ⅲ期	铸铜有关的祭祀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288, 附表五)
	1958~1961	H39		√		苗圃Ⅲ期	铸铜有关的祭祀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288, 附表五)
	1958~1961	H31		√	碎陶范、陶片	苗圃Ⅱ期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25)
	1958~1961	H104	√		卵石 3、牛角 2、陶片 30 块	苗圃Ⅲ期	利用废坑埋人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 pp.26—28)

续表

遗址	发掘年份	单位	人骨	动物骨骼	出土器物	期别	性质	资料来源
王裕口南地	1997	H3			第4层出土陶鬲、钵、豆等陶器残片和若干动物骨骼；中部发现1件完整陶鬲通体熏黑和1件大鹅卵石一面烤成红色	不明	祭祀坑	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 2004.5)
	2009	H509	✓			三期	祭祀坑	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 2012.12)
	2009	J5	✓			三期	祭祀坑	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 2012.12)
刘家庄北地	2008	H524	✓	✓		三至四期	存在频繁打破的现象, 说明在此区域进行的祭祀活动较为频繁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 2009.7)
	2008	H326			铜圆鼎、分裆罍、提梁卣	四期偏晚	小型铜器窖藏坑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 2009.7)
	2008	J31			红陶罐和灰陶罐各3件, 另有铜爵、残铜觚、铜觥盖、铜罍肩部兽首所衔圆环各1件, 铜罍、铜提梁卣等若干铜器残片、4件鹿角锥和1件石器	三期晚段	水井仪式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 2009.7)
	2008	J30			2件灰陶罐、2件红陶罐和1件四足铜盃	四期晚段	水井仪式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 2009.7)
	2010~2011	H77	✓		铜印章1枚、陶鸛人面像2座	二期	祭祀坑(人祭坑); 与制陶作坊有一定关联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 2012.12)
	2010~2011	H1050	✓		卜骨1块	二期	祭祀坑(人牛混祭坑)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 2012.12)

续表

遗址	发掘年份	单位	人骨	动物骨骼	出土器物	期别	性质	资料来源
刘家庄北地	2010~2011	H2479	√		石头一块附有红漆, 近头部位置	不明	圆形窖穴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 2010~2011 年发掘简报 (考古, 2012.12)
	2010~2011	H2498			铜尊 2 件、铜罍 1 件、陶甗 1 件	四期晚段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 2010~2011 年发掘简报 (考古, 2012.12)
花园庄南地	1986~1987	M3	√			不明	无葬具、人骨架残缺, 可能是祭祀坑	1986—1987 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92.1)
花园庄东地	2000	H3	√			三期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 (2007, p.7、p.8)
	2000	H18			完整陶鬲、陶罐各 1 件	二期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 (2007, p.7、p.8)
张家坟	1958	H7	√			苗圃 III 期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 (1987, p.105)
	1958	H8	√			苗圃 III 期	废坑埋人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 (1987, p.105)
新安庄	2007	H11	√			不晚于四期	杀人祭祀坑, 此现象可能与殷代“伐头”“腰斩”“刖刑”等不同杀祭方式有关	河南安阳市殷墟新安庄西地 2007 年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考古, 2016.2)
	2007	H207		√		二期	陪葬坑, 坑西侧约 0.5 米处有一座较大的殷代墓葬 M139	河南安阳市殷墟新安庄西地 2007 年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考古, 2016.2)
	2007	H221	√			三至四期	公共祭祀场所	河南安阳市殷墟新安庄西地 2007 年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考古, 2016.2)

续表

遗址	发掘年份	单位	人骨	动物骨骼	出土器物	期别	性质	资料来源
白家坟东地	1958	VDT2			陶罐 1 件	苗圃Ⅲ期	含义有待探索，可能与祭祀有关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p.115）
孝民屯	2003	G1	√		铜镞	不晚于三期	祭天或祭祖神的祭坛	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环状沟（考古，2007.1）
	2003	G2	√		陶器、石器、蚌器、骨器、角器、卜骨等	有四期典型遗存	祭祀遗存	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环状沟（考古，2007.1）
	2003	H83		√	与 G2 出土遗物种类大致相同	有四期典型遗存	祭祀遗存	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环状沟（考古，2007.1）
	2003	H265		√		三期	铸造活动有关的祭祀坑	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 2003～2004 年的发掘（考古，2007.1）
	1960	T106 南壁偏西		√	牛架肩胛骨侧有罐底 1 片	苗圃Ⅲ期	牛骨架用途不明，所在区域近铸铜遗存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1987，p.66）
孝民屯东南地	2001	H27		√		三期	牛骨架可能和铸铜祭祀有关	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3）
孝民屯南	1990	H9	√	√			墓穴外的祭祀遗存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p.358、p.359）
	1990	H1	√				墓穴外的祭祀遗存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p.358、p.359）
	1990	H5			鹿角和骨器		墓穴外的祭祀遗存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p.358、p.359）
小屯南	1973	H33	√	√			祭祀坑	1973 年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1）

续表

遗址	发掘年份	单位	人骨	动物骨骼	出土器物	期别	性质	资料来源
辛店	2018~2019	H328		√		殷墟时期	与铸造祭祀活动有关	河南安阳市辛店铸铜遗址 2018~201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11）
		H340	√	√		四期	祭祀活动与青铜器铸造的某个环节有关	河南安阳市辛店铸铜遗址 2018~201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11）